

中国铜元资料选编



江苏省钱币研究会编印

中国铜元资料选编

征求意见本

江苏省钱币研究会编印

中国铜元资料选编

江苏省钱币研究会编印

丹阳人民印刷厂印制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字数：56万 图版：177页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 册

苏准印(88)第293号 定价每本收工本费12.50元

责任编辑：吴榕 张筱奔 汤可可 任白

序

一

铜元是在清皇朝末期风雨飘摇、内外交困的动荡景况下产生的。它从1900年诞生起，在清末与民国的动乱年代，始终处于混乱状态，一直到四十年代退出历史舞台。研究铜元的兴亡及其转化，对研究这半个世纪的旧中国，可提供若干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兹从四个方面对铜元所走的历程作一简要介绍。

（一）、铜元的产生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帝国主义国家已在旧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形成瓜分中国局面。在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双管齐下的危急情况下，充当侵华急先锋的外国银行和外国货币，占领了中国市场，驱逐了原有的制钱，利用旧有的银两制，向内地渗透。迫使清政府采取另一种铸币形式，摹仿外国铜辅币形制又保存制钱的实质，铸行铜元。起初，系仿自香港的港仙和日本的铜币，以“仙”为计算单位，取消中孔，花纹式样精巧。光绪年间，制钱制度崩溃。因铜价昂贵，很少再铸制钱；原有的制钱又多被熔化改铸恶钱，试用机器制造制钱也失败了。但民间需用铜钱作小额交易授受却不可少。于是，就从仿铸铜元进到自铸铜元，把计算单位从“仙”改为“文”，把保留下来的在市面流通的咸丰当十大钱作为榜样，以“当制钱十文”来计值。所以，最初铸造的铜元，就是将大钱的型式参照港仙的式样而稍加改变的，每枚合制钱十文，实际上等于铸造一种新的没有方孔的当十大钱。它是大钱的继承和演变，是代替制钱

的新货币形式。它是从封建性货币向资本主义货币过渡的币制，比制钱稍有进步。开始时，铜元与银元并行，不分主辅币，后与银元挂钩、成为辅币，逐渐演变成为法定辅币，又转化为各种硬辅币。但它从形式到内容，自始至终，都是深深地打上了传统铸币减重思想和大钱形制的烙印。铸大钱的起因和目的只是为了解脱财政困难而充当开辟财源的手段，结果总是铸币贬值和导致通货膨胀。铜元的开铸及其结局也是这样。

（二）铜元的形制 铜元又称铜币、铜板、铜角子、铜壳子、铜子儿等。它的种类很多，有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二十文、十文、五文、二文、一文等八种，后三种铸造极少，前三种通称大铜元（五百文大铜元也出现过）。二十文和十文两种数量最多，流行最广。十文者称为当十铜元或“单铜元”；二十文者称为当二十铜元或“双铜元”。它们的流通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大体上湖北、江西、北京多流通双铜元。单铜元流通区域最广，除大铜元流通区域和边疆地区外，几乎在全国范围内通用。而单铜元与双铜元的流通区域在某些地区也随着政治经济情况变化而出现相互交错现象。在某些地区则流行大铜元。如湖北的沙市、宜昌地区用当五十铜元，汉水上游和湖南西北地带用当五十至当二百大铜元，四川全部用当二百和当百大铜元。东三省则用日本铜币。宣统二年（1910年）的《币制则例》，定铜元为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1914年的《国币条例》，规定两种新铜辅币，中央有圆孔，有一分和五厘两种，均为银元的辅币。天津厂曾铸过一分铜币2,822,042枚，五厘铜币1,723,380枚，留存下来的极少。（详见本书（指千家驹、郭彦岗著《中国货币史纲要》）第一、第二、第三各章）

宣统元年（1909年），德国在青岛曾发行五分与一角两种辅币。国币条例中也规定发行五分镍币一种，重七分，成色铜75%、镍25%。后来广东、云南都发行五分与一角两种镍币，广东的中有小圆孔。

铜元的形制。清朝铸的有两种。一是“光绪元宝”，广东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首创，当十文的每枚重二钱，成色铜95%，铅4%，锡1%；圆形无方孔。钱面正中一圆圈，内有“光绪（或宣统）元宝”四个汉字，内加满文宝广二字。圈外靠近外部有“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字样，后改为“每元当制钱十文”。钱背正中圆圈内有一蟠龙花纹，四周有英文“Kwangtung One Cent（广东一仙），后改为Ten Cash（十文）。各省仿铸广东铜元，基本形制相同，蟠龙花纹各异，钱面、钱背的文字排列、作价、措辞更是各种各样，版别极多，每省各有百十种之多。二是“大清铜币”，形制统一，钱面正中有大清铜币汉字，内有一小字表示省名或地名，上端有满文大清铜币字样，两侧为年份、如丙午等。边缘分列“户部”二字，下面为“当制钱十文”。钱背蟠龙居中，上端是“光绪（宣统）年造”，下端英文“Tai-Ching Ti-Kuo Copper Coin”（大清帝国铜币）。

民国所铸铜元更为复杂。较通用的是钱面有交叉五色旗与军旗图案的，还有“开国纪念币”“共和纪念币”等。民国铜元的成色重量，按币制条例规定，当十文的减为一钱八分，成色铜九五，锡四、铅一。各省所铸均低于此标准。就在同一地区同厂同一式样的铜元，其重量成色也相差很大。例如，图案为叉旗与嘉禾者，最重7.218克，最轻5.702克，平均6.454克；其中含铜量最重6.71克，最轻5.35克，

最重与最轻的差距，重量达26.55%，成色达27.8%。而清朝铜元，如江苏所铸，最重8.402克，最轻7.098克，平均7.373克、含铜重量，最重8.04克，最轻6.76克。均比民国铜元高。还有一种黄铜元、由铜80%与锌20%配合而成，质最差。

（三）、铜元的兴衰 公元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李鸿章在广东仿港仙首铸铜元。时值制钱缺乏，铜元式样新颖，颇受欢迎。加之铸造铜元，获利甚厚，各省均视同筹措地方经营之财源，群起竞铸。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开铸仅五年，已有十七省设铜元局二十处，广铸铜元。这是铜元发展过程中的全盛时期。当时铜元与银元比价，1905年以前，银元一元可换铜元枚数，在胶州为80，安庆95，苏州80，杭州90，宁波95，上海92—95，超过规定比价（1：100）5—15%不等。

清政府与各省都把铸造铜元作为筹款济急的捷径，竞相设厂铸造。如江苏就有清江、南京、苏州等数厂、到光绪三十一年，已铸行75亿枚，比上年猛增4.5倍。各省所铸铜元的式样、成色、重量都不同。如光绪元宝铜元13种中，江苏造的重7.66克，江西的仅6.88克，最轻，平均7.35克。大清铜币13种，广东造的最重为7.41克，最轻为宣统元年造6.53克，平均7.13克。比光绪元宝平均减重约3%。四川的二百文大铜元分别重26.99克（赤）及25.93克（黄）。有些省尽量把本省已铸铜元向外省倾销，同时又严禁外省铜元入境或在本省流通。铜元铸行不到十年，已形成一片混乱。到民国时期、因军阀混战，地方割据和滥铸，铜元贬值，混乱不堪。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很多，也有不少的分析，详见后引有关各章节所载资料。清王朝和北洋政府均曾多次找出整顿措施，实行裁并铸币厂和铜

元局，统一铸币数，限制各厂铸额，控制铜斤供应等等，均因各省各自为政，百般阻挠，未能实行。铜元币值不断下跌。光绪三十四年，每个当十铜元打六七折行使。上海一元银元可换铜元123枚，宣统三年可换134枚。同期苏州132枚，杭州130枚，北方地区高达170—180枚。清廷对此已束手无策，铜元泛滥成灾，贬值每况愈下：“及清亡，而铜元遂为病恶币矣。”（见戴铭礼：《中国货币史》）

民国时期，各省封建割据势力互相混战，又纷纷设厂铸造铜元，用以筹措军费、竞相滥铸，营私分肥，毫无章法，遂致铜元质地恶劣，价格暴跌。如上海，一元银元兑换铜元枚数，民国元年（1912）为123枚，1916年127枚，1921年154枚，1927年294枚，1930年跌到301枚，比刚发行时下跌三倍。北洋政府也同清朝一样采取那些整顿办法，结果根本行不通。各省不仅不停铸、停办厂或压缩铸行数额，反而纷纷开办新厂，滥铸劣质铜元，牟取厚利。北伐以后，铜元逐渐被镍币所代替而退出流通。

（四）铜元衰落的原因 铜元始终紊乱的原因很多，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纯属财政性发行和分散发行，漫无限制的滥铸。如光绪三十年至三十四年的五年中，就铸了120余亿枚。供过于求，市场的铜元流通量远远超过同期商品流通需要量，当然受到货币流通规律的惩罚，造成铜元急剧贬值，各种铜元的币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相差悬殊。

第二、钱法虽有若无，有法难行。铸造铜元只是为了追求铸利，开辟财源，筹措军饷，又同银元、银两并行，也没有法定比价和主辅币关系，增加了货币多元化的复杂性。即使有些规定（如几个条例），也难以执行。各省各自为政，

任意滥发，毫无章法，既多且劣，终致溃败。

第三、自坏成法，各地竞争渔利。清廷和北洋政府颁行各种条例，却自己破坏。如政府不按市价收回铜元。浙江膏捐局不收铜元。上海制造局向江苏领取铜元要按九折计算。地区之间又互相封锁、抵制和倾销，更形混乱。因交通不便，铜元多集中大城市而过剩，偏僻地区缺乏，官商趁机勾结操纵铜元价格，波动剧烈。外商倾销其“洋私”（即洋商私铸劣质铜元），更是火上加油，愈增混乱。

（以上引自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史纲要》第六章第三节、节录。参阅《清史稿》卷124卷99食货五，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上总论，铜元。）

二

中国铜元铸行的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一）辅币的性质不明确。铜元本是辅助货币，这是由它以贱金属铸成、供零星支付之用所决定的。但是，它又并不完全符合近代辅币的条件。首先，辅币不能自由铸造，只能由国家用属于国库的金属垄断铸造，铸造量有严格的限制，这样才能保证不足价的辅币正常流通，使由于其实际价值低于名目价值而产生的铸币收入归国家所有。其次，辅币在流通中只能作有限的支付，即一次支付数量不超过一定限度，以防止辅币排挤主币或在流通中积存下来。可是，中国铜元一开始铸行就被确定为“与制钱相辅而行”，“以代制钱之用”，把它等同于形成独立系统的制钱，根本没有从改革旧制、厘订新制来看待铜元与制钱的更迭。当制钱逐渐退出流通时，还特地铸发小钱，来辅助铜元的兑换和找零。这

就模糊了铜元作为银元辅币的性质。至于铜元铸造毫无控制，各省滥发无度，以及在实际授受中没有数额限制，更使得铜元越出辅币的范畴，处于盲目状态。结果是，只有不足价辅币资格的铜元，却以无限法偿的规模在流通。国家又缺乏维持其法定价值的权威和有力措施，只是象制造商推销商品一样把它出卖给银行钱庄，那就必然陷入壅滞阻塞的困境。

（二）处于分散割据状态。铜元的铸造权从一开始就掌握在各省督抚手中。盘据各地的军阀官吏都凭藉自己的势力扩建造币厂，大批采购铜斤器材，大量铸发铜元，以攫取造币的丰厚余利。任直隶总督时的袁世凯公开说：“各省帑项支绌，筹措为难，惟铜元余利一端，尚堪挹注”。在江苏任督抚的端方、周馥也承认：“到任之初，即首以推广铜元为事”，“各处扭于余利，一若以铸币为筹款”。除办学、练兵外，从造币厂提成留利、一饱私囊的所谓“花红”，也成了公开的和“合法的”。此外，造币局厂本身也是制度松弛，各级员司贪污舞弊，从中肥私。他们私自延长开机时间，将多铸的获利攫为己有。这种私铸被称为“局私”（与民间盗铸的“民私”相区别）。所谓“民私”更是禁而不止，奸商、劣绅利用手摇机器私下仿铸，甚至有用砖模、泥版翻铸者，叫做“沙皮”、“白版”。其规模虽然不大，但更为分散，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品名、面值、重量、成色，更加纷歧杂出。中央政府对此缺乏统制能力，不仅制造数量无法控制，就是对各地的规格、质量、式样等也不能有所规约。因为品类繁杂，各省间互相抵制，许多铜元只限本省流通，造成地域分割。这种经国家承认、以省为别、划分畛域的货币，在各国是不多见的。它不仅承袭了清代制钱各

铸局名的旧制，更充实了军阀割据的内容，在近代货币形式的躯壳中依附着封建主义的幽魂。

（三）受到帝国主义的钳制和侵扰。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中国的货币流通不仅受到国际金融市场起落的影响，而且受到帝国主义在华银行的直接操纵。在铜元问题上，当铜元比价较高时，各国通过各种渠道大量输入铜料，包括可以直接冲铸铜元的铜饼，牟取巨利。或者在国外伪造中国铜元，走私入境；甚至就在中国境内（例如大连、青岛、上海、梧州等地）私铸铜元（统称为“洋私”），以较低的价格大批抛售，吸收金银，以此扰乱中国的币制金融。而在铜元价格下泻的时候，又趁机利用纸钞大量收进，劫夺中国的物资。到七七事变前夕，日本侵略者通过伪满银行把流通于东北全境的新旧铜元收购一空。前后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世界市场上金银价格起伏不定，国际金融资本屡屡掀起风潮。在华的各国侵略势力，更是以“援助”、“整理”、“善后”等名义，利用外债、抵押和货币发行、兑换，有恃无恐地打击中国货币的信用，操纵汇率、物价、倾销商品，掠取原料，控制资金融通，从而节制中国的国民经济。可以说，近代中国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始终摆脱不了国际金融资本的牵制，始终只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泥潭中挣扎。

（四）以掠夺劳动人民为目的。铜元的铸行从一开始起就是为了解救财政危机。清政府以它的赢利来填补甲午、庚子两次战争赔款所造成的财政窟窿，添置镇压人民反抗斗争的军备。即使是所谓“藉铜元余利，以为兴办地方新政之用”，也是以维护清皇朝的腐朽统治为最终目标的。民国初期各处督军，司令滥铸铜元，更是“筹军饷，饱私囊，视铜币之铸造为点金术而已”毫无疑问，所有这些赢利都来自于

对人民的搜刮。即使是当时在华的外国人也说：“降低硬币内在价值、滥加铸造，实质上就是对最贫苦大众进行掠夺的巧妙手段”。

币制问题可以说是困扰中国近代几乎所有统治者及其僚属的难题。它的混乱程度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回溯这一段历史，重温其经验教训，对于认识过去的时代，为现实的经济运行提供借镜，以及丰富金融货币理论，都不会是无益的。回顾、总结中国近代铜辅币的铸行，至少从货币制度本身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其一，维护货币体制的一元化。中国近代铜元之所以混乱和信用急剧低落，基本原因之一就是货币制度不统一。铜元的问世没有与已经通行了几十年的银元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从而取代平色不齐的银两，大小不一的制钱，以及零乱不堪的银铜钱票。恰恰相反，它代替制钱又承认制钱，并与之平行流通；它仿照银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样，就在已经是多元的货币制度中，又增加了一个系统，在实际流通中也就必然引起相互间比价的参差起落，造成币政紊乱，并带来货币的投机经营。另外，中国近代货币的行用带有浓厚的地方割据的特质，在货币品类的多元以外，还造成流通地域上的多元状态。“新疆习用红钱，甘肃习用制钱，奉天则习用银毫”，内地行用铜元，又有大小、紫黄颜色等区分，各地“习惯相悬”，互相排斥。其结果也必然限制货币的广泛流通，自限信用。所以，货币稳定的首要条件乃是货币制度的一元化，对外独立自主，对内集中统一，从货币规格的统一到币政的统一，防止歧出，才能有效地控制铸发和流通，防止不足价的辅币和充当价值符号的纸币发生贬值。

其二，维持主辅币的恰当比例。近代铜元对于银元的辅

币关系不明确，再加上滥铸无已，当然谈不上保持两者之间的恰当比例。它一旦失去与银元的比例，超出了找零和兑换所需要的量，也就难以保持由法律所确定的与银元的比价。马克思说过，作为辅币的银、铜记号的“发行量只应该限于它们所代表的金铸币的细小部分为兑换较大金铸币或实现相应的小额商品价格所需要的经常流通的量”。铜元铸行超过了这个量，也就必然地从流通中离析出来。与金银所不同的是，它除了被当作金属来处理，不可能硬化为贮藏货币。有人在总结中国近代货币流通历史经验时说，“中国人民传统地对于现代货币没有多大信心，货币的流动偏好程度很低”。在这信金银，而对贱金属辅币和无价值的纸币不信任的情况下，要保持辅币的正常流通，必须在稳定本位币的基础上，以主领辅，严格限制辅币的发行额，也限制其使用额，以维持主辅币的正常比例，从而稳定其法定比价。

其三，维持辅币之间的恰当比值。通常，为了防止被人熔销改铸，金属辅币的铸造总是采用较低的成色，而不同规格的辅币中，面额越小，成色越低，份量越轻，以拉大名目价值与实际价值之间的差距。有人称之为“反货币原理”。但中国近代铜元的情况与此正相反。以民国初年的四川铜元为例，其当二百文重25.9克；当百文重21.6克；当廿文重10.1克；当十文重7.4克。再如天津所铸“壹枚”铜元实际价值与名目价值之比为58.3%，而“双枚”仅为48.8%。这也就等于说，熔化当量的小面额辅币，可以改铸更多的大面额辅币。即使是同一造币厂同一规格的铜元，其轻重成色也先后不同，最多相差达26%。在金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就必定导致熔小铸大，大铜元泛滥，币值跌落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小面额辅币短缺，各种竹、木、铅、纸代用币蜂

起，进一步加剧币制的混乱。所以，掌握辅币系统内的恰当比例和比值，也是稳定辅币流通的重要一环。

其四，加强货币流通的调节和货币经营的监督。近代铜元铸造分散，流通分割，一方面各省互相封锁，禁止外省铜元流入，如山东订立《铜元出入口规则》，加以限制；湖北则设立铜币检查所，防止湖南铜元运入。另一方面，各省又将本省铜元尽力向外倾销。如江苏本有三处铸局，所铸铜元足够应用，但广东、湖北、浙江、福建等省“或委员设局运售，或给照招商贩卖”，到苏省推销，结果是“市廛拥挤，销滞价落”。当时有人记述各省之间的铜元“浸灌”说：

“苟为行销之谋，以至折价私售，自九扣至六、七扣不等”。事实上，除了自贬价格外，还有互相压价，河南、福建等省通令对外省铜元一律贬价行使。上海向江苏领取铜元，要求一律按九折开价，以分取铸币余利，结果是上海的铜元市价因此下浮。趁着铜元市价涨落不定，一批投机商人吞吐抑扬，从中牟利，加剧了流通的混乱和信用的败坏。所以，对货币流通采取放任政策是不足取的，而要通过经济的、法律的、乃至行政的手段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节，恰当地均输平准，平衡供求，维护法定比价。同时，有必要建立社会货币流通的调查机构和监察机构，掌握货币流通的实际情况及其动态，对货币经营的囤积贩运、哄招强抑等投机行为给予制止和制裁，才能保持货币流通的正常运行。

当然，货币的稳定最终取决于国家政治体制的完善和社会经济的综合平衡。以上仅仅是从货币制度本身所作的最粗略的概括。旧的铜质辅币的流通已经成为过去，但是，近代铜元流通的特殊历史过程所揭示的若干教训，也许对今天的货币流通仍有一些值得借鉴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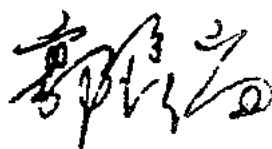
（以上引自汤可可1987年4月送江苏省钱币研究会第四次年度交流文章：“铜元铸造流通的历史经验”，节录。）

三

从上述铜元的诞生、兴衰及历史经验来看，在中国经济史和货币史的历史长河中，铜元的存在的时间极为短促，几乎是昙花一现；但它的内涵却是风云变幻、波涛起伏，且覆盖全国，影响久远。有关铜元的著作、文献、资料也是极其丰富的，历来都视为研究中国近代史、近代经济和近代金融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从铜元的产生、发展及其盛衰历程，可从一个侧面，反映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旧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情况下的苦难历程及其经验教训，可供借鉴。进入八十年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全国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事业都展现了新的面貌，钱币研究也在大好形势下深入开展，其中对近代货币史和铜元的研究也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江苏钱币学会组织全省铜元研究力量，编纂这本《中国铜元资料选编》，对今后的铜币和货币史研究，也作出了明智的一举和卓越的贡献。这本资料选编，立足于本省，依据于国家档案馆和财政金融研究部门多年来已经集中的历史文献资料，广泛收集有关方面的科研成果，分为四个部份，即：中国铜元文字资料选编，中国铜元图录选编，关于中国铜元的基本文献资料 and 有关铜元的论述选编。其中文字又分为六章，包括晚清铜元、民国铜元及铜辅币，革命政权的金属铸币，伪组织的金属辅币，各省市铸造铜元局厂资料和铜元流通情况资料，内容精彩，颇具特色，计有以下五点：第一、此书虽是资料汇编性

质的丛书，却能自成体系，结构谨严，脉络清晰，前后呼应。使人一目了然，阅读方便。确系一座有关铜元研究的指路标牌，对钱币收藏爱好者和从事科研、教学者均有裨益。从总体结构看，这是一部好书。将来如可能，希再继续深入和扩展，把自此以后新发表的科研成果，考古发掘和新发现的文献资料，以及在本书已收集范围以外的全国各地区的有关铜元资料陆续编入。第二、文字资料中的各章，按照铜元和铜辅币产生、演变、兴衰、转化各个阶段，有层次地步步深入，引人入胜，为铜元研究提供有系统、有分量的资料，确实难能可贵，独具匠心。这种对资料的处理方法，可免去一般资料编辑的刻板老面孔，把死资料变活了，一点不感到枯燥乏味，而是使人感到春色满园，曲径通幽，姹紫嫣红，美不胜收，越读越有味。这种用编写专著和学术论文的办法来编辑历史资料，可继续深入探讨，发挥其应有效益。第三、在有关铜元发展历史的资料组编中，引用许多权威专家学者的学术论著，剪辑和节录的内容，恰到好处，很能说明问题。这种资料处理办法，也是一种革新。这种做法，并非轻而易举之事。编辑者需要对此道有深厚功底，並反复钻研，才有可能做到在百花园中掇其精英，博采众家之长，供我所用，帮助读者较快地认识历史全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第四，对铜元历史资料的编排，还注意到铜元产生及其演变的历史背景、与当时政治经济的关系，因此，不仅大量编排有关铜元的铸造、形制、成色、轻重、大小、面额、种类、币材等基本数据资料，更注意安排有关铜元的流通、购买力、同银元的比价关系、管理措施及政策，分析铜元紊乱和衰落的原因、以及从中吸取的历史经验等等，还收集有关私铸、私运、外商的活动，各界人士的反应等等。对分析研究问题很有

帮助。这样，可以扩大视野，有利于深入探讨问题，提高对铜元的研究水平。第五、无论是图录、文献资料、基本资料都是内容丰富多采，更有许多过去少见的新材料、新图片。尤其是从两个档案馆收集到的许多历史文献，尤为难得，对研究问题很有用。其中第七章所列的十二件基本文献资料不仅对研究铜元有用，对研究经济史货币史也是不可少的。总之，这本资料选编是研究铜元和硬辅币的一份珍贵资料。故欣然应江苏省钱币研究会所邀写此序言，並表祝贺。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高震' (Gao Zhen),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九日